

# 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的 “增收”和“保基本”效果分析 ——以广州市数据为例

贾东岚<sup>1,2</sup>

(1.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29; 2. 中国劳动学会, 北京, 100013)

**摘要:** 作为政府规制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分配的唯一法定收入标准, 最低工资是保障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也是国家“提低、扩中、控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中“提低”的主要措施之一。本文以广州市低收入宏观数据及微观流动人口数据为例, 立足于评估最低工资调整对劳动者“增收”和“保基本”的效果, 旨在分析最低工资调整是否满足了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及对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的异质性差异如何。研究表明, 最低工资标准基本能保障最底层收入家庭基本生活, 并且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工资存在正向效应, 且对于男性、30岁以下、最低工资标准附近收入等组别的收入效果更为显著, 同时存在对收入的溢出效应。

**关键词:** 最低工资, 收入效应, 保基本生活, 流动人口

作为一项工资保障制度, 国外最低工资的建立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期, 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立最低工资标准, 该标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自1993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 2004年颁布实施《最低工资规定》, 反映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进一步健全, 覆盖范围全面扩展。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第135号建议书中明确了“最低工资的根本目的是为工资劳动者得到可容许的最低水平工资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 并“应当成为旨在战胜贫困、保证满足全体工人及其家庭需要的政策内容之一”, 即最低工资最基本的目标是减少贫穷, 确保最低生活水平<sup>1</sup>。

全球各国在设定最低工资时, 其定位和目标各有不一。英国在2016年之前强调的最低工资基于“工资下限”理念, 该国推行全国最低工资是为了防止工人受剥削, 同时也确保公司在经营业务时以货品及服务质量来竞争, 而非主要靠压低工资以求削价竞争。英国于2016年起在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中针对25岁以上劳动者增设一个强制性“生活工资标准”, 政府旨在将英国目前“低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社会导向转为“高工资、低税收、低福利”社会; 法国制定最低工资的理念是“生活工资”, 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是给予最低劳动收入的劳动者购买力的保证; 二是保证低收入人群在国民经济中的劳动参与。

---

**作者简介:** 贾东岚, 女, 硕士, 副研究员,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薪酬研究室, 兼任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研究方向为国内外最低工资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研项目“农民工收入与扶贫脱贫研究”(项目编号: 2020-pgs-008)。

---

<sup>1</sup> 参见ILO1976年关于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进步和国际劳动分工问题的三方世界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与原则宣言》。

在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设置的基本功能定位是：劳动者在提供正常劳动条件下，能够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sup>1</sup>。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作为政府调节企业工资分配的重要“抓手”，最低工资是保障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提低、扩中、控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中“提低”的主要措施之一。那么，最低工资调整是否满足了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对于劳动者收入有多大影响？本文以广州市为例，立足于评估最低工资调整对劳动者“增收”和“保基本”的影响效果，特别是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 1. 文献回顾

最低工资政策评估一般从最低工资对劳动者、企业、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影响分析，这类影响研究是经济学领域研究频率较高的课题之一。一直以来，国际上部分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面。国内外关于最低工资对收入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工资分布的溢出或涟漪效应、工资差距以及通过影响工时进而间接影响劳动者收入的相关研究。最低工资对工资的影响可能直接反映为相关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也有可能进一步通过间接方式改变工资差距和工资分布。在现有的研究中，这些效用都得到了验证。学者Manning用均衡工作搜寻模型，发现提高最低工资产生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工资略高于最低水平的人群附近<sup>[1]</sup>。Flinn引入工资谈判机制的结构搜寻模型，分析显示工资的分布在最低工资处呈现钉状，并产生工资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的溢出效应<sup>[2]</sup>。Neumark和Wascher的研究结果表明州最低工资和美国青少年次最低工资与工资的分布在

最低工资处呈现钉状之间的关系<sup>[3]</sup>。Neumark等采用面板数据估计了最低工资调整对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有直接正面影响，但对工时有消极影响，进而导致总收入水平降低<sup>[4]</sup>。Grossman是首位试图对最低工资溢出效应进行直接预估的学者。她使用BLS的区域工资调查（AWS）数据预估分析了联邦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低薪岗位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sup>[5]</sup>。

我国最低工资研究起步晚，且研究基本基于国外成熟模型和方法进行分析。罗小兰和丛树海运用均衡模型研究表明，总体上最低工资标准对平均工资的变化具有极小的正影响，并且这种正影响不具有持续性<sup>[6]</sup>。孙中伟、舒玢玢对珠三角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月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流动人口平均工资影响显著，最低工资标准每增加100元，流动人口工资就会增加70元<sup>[7]</sup>；而马双、杨娟等采用企业层面或劳动者数据分析最低工资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弹性系数为0.04~0.05之间<sup>[8-9]</sup>。贾朋的研究证实了最低工资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工资和就业具有溢出效应，对男性和女性工资的溢出效应可以分别达到最低工资的1.50倍和1.25倍，随着相对工资区间的升高，溢出效应均呈现下降趋势<sup>[10]</sup>。

我国现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2010年前后甚至更早的数据，最低工资在2010年之后经历了先快速高幅调整、再降速降幅调增的过程，特别2015年左右各地开始注重最低工资评估政策的实施，因此在评估最低工资标准是否符合基本功能定位的同时，需要继续关注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影响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不同特征群体间差异分析。本文将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的对广东省2014-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异质性差异影响，并结合地方统计局数据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保基本”功能进行评估分析，以期对地方最低工资评估领域提

<sup>1</sup> 依据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

供技术性和实操性支持。

## 2. 广东省近年来最低工资保基本效果分析

### 2.1 最低工资与最低20%收入户基本消费支出的比较

评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是否科学合理，最基本的是要立足于最低工资标准功能定位，即需看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能够满足低收入群体家庭基本生活需求，比如，按照五等分法分组的城镇居民20%低收入户的平均现金消费支出水平，或以七分法分组的10%低收入户的平均现金消费支出水平。本部分将以广州市为例，根据广州市统计局数据测算该市2010–2018年最低工资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同当地最低工资比较情况。

数据显示，尽管最低工资难以保障最低20%收入户家庭消费支出总额，但对于居民衣食住行而言，大部分年份最低工资对于基本生活保障有富余或差距不大，如果以10%低收入群体作

为观察对象的话，那么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问题不大。部分媒体在宣传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远低于国际惯例40%之类的概念时，忽略了我国最低工资的功能定位是“保基本”，而不是达到一定程度的购买力或者是较高水平体面生活的工资水平，同时也忽略了采用同口径对标国际常用来反映最低工资效力的凯茨指数<sup>1</sup>，即最低工资和工资中位数的比值。我们研究国外该类指标发现，国外采用的“最低工资占全职劳动者收入中位数比例”基本维持在35%~50%左右，个别国家最低工资与“生活工资”的比值超过60%。如2013年江苏省采用当地人社部门薪酬调查数据计算后发现，各城市最低工资占工资中位数比例大多在43%~48%之间（平均占比46.9%），其中，盐城市占比最高，达到近51.5%。扬州和泰州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41.4%和43.8%。也就是说我国最低工资占工资中位数的比较也达到40%以上。

表1 广州市2010–2018年最低工资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分析表（元）

年份	低收入户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	低收入户年消费性支出	低收入户月人均现金消费支出	低收入户月人均衣食住行	低收入户家庭消费性支出	低收入户家庭衣食住行支出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低收入户家庭消费支出	最低工资-低收入户衣食住行支出
2010	1.80	11768	981	701	1765	1262	1100	-665	-162
2011	1.83	13050	1088	832	1990	1523	1300	-690	-223
2012	2.07	14146	1179	853	2440	1765	1300	-1140	-465
2013	2.07	15516	1293	935	2677	1935	1550	-1127	-385
2014	1.77	19077	1590	799	2814	1414	1550	-1264	136
2015	1.78	21748	1812	905	3226	1611	1895	-1331	284
2016	1.85	23835	1986	949	3675	1755	1895	-1780	140
2017	1.73	25439	2120	1279	3667	2213	1895	-1772	-318
2018	1.73	26463	2205	1337	3815	2313	2100	-1715	-213

说明：表中低收入户指按照收入五等分法分组的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即最低20%收入户。

<sup>1</sup> 凯茨指数是美国经济学家最早在1970年提出的反映最低工资相对水平的计算公式，原本计算需要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来估算，而后很多学者采用简化后的凯茨指数用于分析最低工资政策，即最低工资标准/工资中位数或平均工资的比值，简化后的凯茨指数又经常用来反应最低工资效力的大小。实践中，各国在计算该指数时一般采用工资中位数计算，这样能避免高估或低估最低工资相对水平。

## 2.2 最低工资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较

最低工资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两者比例关系是否协调，也是评估最低工资标准能否保障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基本生活的一个角度。同样以比重法计算时，二者最大的差距在于“保基本”的程度确定、赡养系数的差别，以及其他差别性影

响因素。数据显示，广州市自2010年以来最低工资标准均超过考虑赡养系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和。从鼓励就业角度而言，考虑赡养系数的低保标准应相当于最低工资的70%左右，由于最低工资连续三年未调整，2017年该比例达到80%以上，其余年份两个标准则较为协调，表明最低工资能较好保证低收入户的基本生活支出。

表2 广州市2009-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较（元）

年份	最低工资	低保	低保*赡养系数	(低保*赡养系数)/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低保*赡养系数)
2010	1100	399	678	62%	422
2011	1300	467	794	61%	506
2012	1300	530	901	69%	399
2013	1550	540	918	59%	632
2014	1550	600	1020	66%	530
2015	1895	650	1105	58%	790
2016	1895	840	1428	75%	467
2017	1895	900	1530	81%	365
2018	2100	920	1564	74%	536

说明：表中赡养系数指广州市最低10%收入户赡养系数，按照1.7估算。

## 3. 研究方法

### (1) 方法选定

本文参照Card等中双重差分<sup>[11]</sup>法估计最低工资的影响。本文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视为一个自然实验，在控制流动人口个体特征的异质性之后，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流动人口工资变动的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基于回归调整的DID模型可以设定如下：

$$y = \beta X + \beta_1 Inner + \beta_2 Group + \beta_3 Time + \varepsilon \quad \text{式(1)}$$

其中， $y$ 表示流动人口月工资的对数； $X$ 是控制变量，表示流动人口的个体和地区特征影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跨地流动、孩子数量、婚姻等， $\beta$ 是其系数； $Inner$ 为交叉项，其 $\beta_1$ 系数反映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流动人口工资的平均处理效应； $Group$ 表示流动人口所处的组别是

否为实验组， $\beta_2$ 是其系数； $Time$ 表示流动人口所处的年份是否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 $\beta_3$ 是其系数； $\varepsilon$ 表示随机扰动项。

###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广东省流动人口动态调查，该调查按照随机的原则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收集了广东省所有市区的流动人口数据，数据内容包括个体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和就业、收入等信息。我们的原始数据来自2014、2015、2016年数据，由于研究需引入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关注的是被解释变量实验前后的变化，2016年广东省全省各市均未调整最低工资，即2014-2015年数据符合模型要求，故仅保留2014和2015年的数据。本文欲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动人口月工资的影响，因此需要设置对照组和实验组。从广东省政府网站公布的各市区最低工资标



准及实行日期来看，在2014年和2015年两次调查期间，即2014年5月份至2015年4月份<sup>1</sup>，广东省内只有深圳市进行了最低工资的调整，从2014年（2月1日起实施）的1808元/月调整到2015年（3月1日起实施）的2030元/月，考虑到经济体量相当的因素，本文将深圳市设为实验组，广州市设为对照组，记虚拟变量 $G$ 表示流动人口所处的组别是否为实验组，其中 $G=1$ 表示流动人口所处的组别为实验组， $G=0$ 表示流动人口所处的组别为对照组。相应地，记虚拟变量 $T$ 表示流动人口所处的年份是否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其中 $T=1$ 表示流动人口所处的年份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即2015年， $T=0$ 表示流动人口所处的年份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前，即2014年。

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根据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首先对深圳和广州之外的数据进行剔除，保留就业身份为雇员的样本，并去除学历为本科和以上的样本点，并根据0, 5, 9, 12对学历进行受教育年龄的转化。同时，去除月工资收入1万元以上的样本和少量数据缺失样本，最终得到了

3354条样本数据。

表3 广州市和深圳市调查月平均收入及最低工资变动

项目	月平均收入（元/月）		最低工资（元/月）
	男性	女性	
2014年4月			
广州市	3572.83	2834.40	1550
深圳市	3854.43	3572.83	1808
2015年4月			
广州市	3727.55	3299.61	1550
深圳市	4603.88	3694.32	2030

### （3）变量选取

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的月工资，反映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本文首先选取了性别、年龄、学历、跨省流动、跨市流动、子女数量、是否结婚等变量作为流动人口收入可能的影响因素。其中，性别、学历等是分类型变量，具体见表4。

表4 影响流动人口工资的变量

变量类型	标签	变量	变量水平	
因变量	月工资	income	建模时对数处理，连续型	
自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gender	男性1，女性0
		年龄	age	连续型
		学历	education	按照就学年限转化为对应的数字
		跨省流动	trans_pro	跨省1，否则0
		跨市流动	trans_city	跨市1，否则0
		子女数量	child	连续型
		是否结婚	marry	合法存续的婚姻关系为1，否则0
		时间项	time	2014年1，2015年0
		组别项	group	实验组1，对照组0
	交叉项	inner	实验组且2015年1，否则0	

<sup>1</sup> 流动人口调查每年5月开展，收入为调查月上月数据。

## 4. 实证结果分析

### 4.1 年龄

我们根据年龄段对数据进行了划分，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结果表明，对于不划分年龄的模型，性别、受教育年限、结婚变量对结果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结婚变量在0.01的水平上显

著；性别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系数为0.1731，在0.01的水平显著；受教育年限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Inner项的系数，即最低工资变动的影响，在0.05水平上显著。30岁以下的样本中，子女数量变量为不显著项，其他变量均显著，其中，结婚变量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7；年龄和性别均0.01水平上显著，其中性别变量系数最大

表5 分年龄回归结果

变量	全部	30岁以下	30-40岁	40岁以上
marry	0.0883*** (0.0232)	0.0701** (0.0356)	0.0199 (0.0508)	0.0927 (0.0811)
child	0.0012 (0.0093)	-0.0274 (0.0169)	0.0106 (0.0159)	-0.0223 (0.0155)
age	0.0006 (0.0009)	0.0167*** (0.0029)	-0.0039 (0.0039)	-0.0170*** (0.0037)
gender	0.1731*** (0.0121)	0.1083*** (0.0161)	0.2068*** (0.0218)	0.2462*** (0.0301)
education	0.0330*** (0.0031)	0.0215*** (0.0047)	0.0404*** (0.0064)	0.0230*** (0.0056)
trans_pro	-0.0078 (0.0207)	-0.0658** (0.0318)	0.0475 (0.0359)	-0.0279 (0.0476)
trans_city	-0.0080 (0.0228)	-0.0788** (0.0333)	-0.0018 (0.0405)	0.0799 (0.0561)
group	0.0693*** (0.0170)	0.0854*** (0.0226)	0.0490 (0.0303)	0.0437 (0.0415)
time	0.0921*** (0.0198)	0.0062 (0.0327)	0.1006*** (0.0346)	0.1418*** (0.0377)
inner	0.0572** (0.0253)	0.0823** (0.0355)	0.0708 (0.0440)	0.0467 (0.0589)
_cons	7.5288*** (0.0481)	7.3826*** (0.0822)	7.6285*** (0.1573)	8.3721*** (0.2139)
N	3360	1540	1095	725
R <sup>2</sup>	0.1504	0.1306	0.1722	0.2223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标准误，\*\*\*、\*\*、\*分别对应1%、5%、10%的显著性水平，表6、表7同。

为0.108；Inner项系数0.0822，在0.05的水平上显著。30岁到40岁样本中，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在0.01水平上有显著影响，Inner项不显著。大于40岁的样本中，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在0.01水平上有显著影响，Inner项不显著。

总体看，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系数为0.0572，而最低工资对3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的收入的影响系数更大，为0.0823，即最低工资每提高10%，3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收入提高0.82%。

#### 4.2 性别

根据流动人口性别进行了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结果表明，结婚对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有负影响，但不显著，对男性流动人口收入则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对女性流动人口收入存在负影响，但也不够显著，对男性则有正向影响，也不显著。受教育年限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差距不大，而且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跨省和跨市流动对男性的工资收入有负影响。

对于最低工资的影响，从男性回归模型和女性回归模型的Inner项上看，最低工资提升对男性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 4.3 收入

关注不同收入组的回归，可以更好地验证假设结论，课题组将最低工资标准的1.4倍以下、1.4倍-2倍、2倍-3倍以及3-4倍和4倍以进行分组回归，具体如表7。

如表7所示，五个组别的Inner项系数分别为0.1614、0.0790、0.1539、0.1317以及-0.0412，其中，收入低于最低工资1.4倍组Inner项在0.05水平上显著，收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4.5倍的群体样本Inner项不显著，其他组别Inner项在0.01水平上显著。

国外研究Dickens和Manning（2004a）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对于那些员工工资水平在最低工资标准1.4倍及以上的企业影响较小<sup>[12]</sup>。但从

表6 分性别回归结果

变量	全部	男性	女性
marry	0.0883*** (0.0232)	0.1675*** (0.0332)	-0.0136 (0.0321)
child	0.0012 (0.0093)	0.0063 (0.0128)	-0.0040 (0.0136)
age	0.0006 (0.0009)	0.0001 (0.0012)	0.0016 (0.0015)
gender	0.1731*** (0.0121)		
education	0.0330*** (0.0031)	0.0277*** (0.0045)	0.0355*** (0.0043)
trans_pro	-0.0078 (0.0207)	-0.0147 (0.0300)	0.0070 (0.0281)
trans_city	-0.0080 (0.0228)	-0.0063 (0.0331)	-0.0083 (0.0304)
group	0.0693*** (0.0170)	0.0507** (0.0234)	0.0827*** (0.0241)
time	0.0921*** (0.0198)	0.0514* (0.0277)	0.1374*** (0.0282)
inner	0.0572** (0.0253)	0.1026*** (0.0353)	0.0063 (0.0355)
_cons	7.5288*** (0.0481)	7.7320*** (0.0651)	7.5262*** (0.0753)
N	3360	1823	1537
R <sup>2</sup>	0.1504	0.1162	0.1132

我们研究中发现，除了对于工资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1.4倍以内）的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外，对于其他在最低工资标准2倍左右到4倍左右的收入群体也有影响。数据系数显示，对于最低工资的影响，最低工资对最低工资标准附近（低于最低工资标准1.4倍以下）收入的群体影响系数较高，即最低工资每提高10%，该群体收入提高

表7 分不同收入组回归结果

变量	OLS	<MW*1.4	MW*1.4-2	MW*2-3	MW*3-4.5	>MW*4.5
marry	0.0845*** (0.0237)	-0.0788 (0.0838)	0.0191* (0.0102)	0.0145 (0.0128)	0.0175 (0.0256)	0.0281 (0.0555)
child	-0.0021 (0.0096)	0.0090 (0.0245)	0.0004 (0.0039)	-0.0015 (0.0053)	0.0027 (0.0090)	-0.0183 (0.0138)
age	0.0014 (0.0010)	0.0016 (0.0025)	-0.0008* (0.0004)	0.0010* (0.0005)	0.0002 (0.0008)	-0.0020 (0.0016)
gender	0.1577*** (0.0124)	0.0153 (0.0311)	0.0197*** (0.0053)	0.0199*** (0.0069)	0.0185 (0.0135)	0.0121 (0.0254)
education	0.0299*** (0.0032)	-0.0102* (0.0062)	0.0036*** (0.0014)	0.0012 (0.0018)	0.0008 (0.0032)	0.0016 (0.0058)
trans_pro	-0.0081 (0.0208)	-0.0492 (0.0444)	-0.0104 (0.0103)	0.0070 (0.0116)	0.0100 (0.0214)	0.0582 (0.0607)
trans_city	-0.0009 (0.0230)	-0.0048 (0.0439)	-0.0074 (0.0111)	-0.0058 (0.0126)	-0.0006 (0.0228)	0.0978 (0.0622)
group	0.1604*** (0.0178)	-0.1578** (0.0677)	0.1356*** (0.0067)	0.1288*** (0.0093)	0.2012*** (0.0193)	0.2314*** (0.0233)
time	0.0917*** (0.0200)	0.0235 (0.0396)	0.0207** (0.0093)	0.0026 (0.0105)	0.0080 (0.0168)	0.0408 (0.0348)
inner	0.0240 (0.0260)	0.1614** (0.0801)	0.0790*** (0.0113)	0.1539*** (0.0137)	0.1317*** (0.0247)	-0.0412 (0.0409)
_cons	7.5486*** (0.0491)	7.5971*** (0.1111)	7.8710*** (0.0217)	8.1720*** (0.0267)	8.5346*** (0.0471)	8.9554*** (0.0792)
N	3097	269	1451	1000	299	78
R <sup>2</sup>	0.1769	0.0903	0.4928	0.5496	0.6665	0.6134

1.61%，而对于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2倍到4倍的群体收入会分别增加1.54%和1.32%。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验证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溢出效应。

## 5. 结论

本文以广州市近十年低收入群体宏观数据为例，评估最低工资调整对劳动者保障基本生活影

响情况。认为最低工资能够保障最底层收入家庭基本生活，能够实现我国相关制度规定中最低工资的功能定位。同时，本文也基于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微观数据，分析最低工资调整对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及其异质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低收入群体工资存在正向效应，且对于男性、30岁以下、最低工资标准附近收入等组别的收入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同时对流动人口收入存在有溢出效应。

数据还显示, 30岁以下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是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增收”更为显著的受益群体。流动人口统计范围中更多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 作为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我国年轻劳动力逐年下降、现代服务业逐步扩大发展, 使得这部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 加之往往新生代群体相对于老一辈学历更高、培训机会较多、维权意识更强, 使得他们具有更多话语权和议价能力。因此, 最低工资的调整对新生代群体的收入影响较为显著。当然, 也不排除老一辈农民工群体基于最低工资是以月度计算的标准, 在最低工资调整条件下, 企业会增加工时和加班工资来对冲月度最低工资标准调增。因此, 应加强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的监察, 维护低收入群体最低工资劳动报酬调整的权益。

最低工资调整对男性有较为显著的增收效应, 而与此同时, 由于结婚和生育子女对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均呈负影响, 以及可能存在如劳动力市场中女性议价能力相对较弱等方面因素, 最低工资调整对女性流动人口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 最低工资不仅仅对领取最低工资标准附近人群有增收效应, 对于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甚至是几倍收入群体也有一定的提升效力。这一效力可能由考虑维持企业内部一定的薪酬差距或相关薪酬指标或结构(如固定部分薪酬、加班工资基数或社保缴费基数)与最低工资挂钩等等因素导致。那么从企业角度而言, 最低工资调整无疑对人工成本可能存在较大范围的影响。因此, 调整最低工资评估时不仅要考虑劳动者权益, 也应谨慎考虑企业成本承受力因素, 特别是经济下行或疫情压力背景下企业承压较大, 后续跟进最低工资对企业人工成本影响的分析显得更为重要。

责任编辑: 贺茂斌 校对: 李琦 梁思琪

### 参考文献

[1] Manning. Monopsony in Motion. [M]. Princeton 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Flinn. Interpreting Minimum Wage Effects on Wage Distributions: A Cautionary Tale[J].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GENES, 2002, issue 67-68, 309-355.

[3] Neumark, Wascher.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and Subminimum Wages: Panel Data on State Minimum Wage Laws[J].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2, 46(1), 55-81.

[4] Neumark, Schweitzer, Wascher. Minimum Wage Effects Throughout the Wage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4, 39(2), 425-450.

[5] Grossman.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other wages[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83, 18(3), 359-378.

[6] 罗小兰, 丛树海. 基于攀比效应的中国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工资水平的影响[J]. 统计研究, 2009(6): 60-65.

[7] 孙中, 舒玢玢. 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民工工资——基于珠三角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1(08):45-56.

[8] 马双, 张劼, 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2(5):132-146.

[9] 杨娟, 李实. 最低工资提高会增加农民工收入吗?[J]. 经济学(季刊). 2016(04):1563-1580.

[10] 贾朋, 张世伟.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溢出效应[J]. 统计研究, 2013, 30(4):37-41.

[11] Card, Krueg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 -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5), 772-793.

[12] Dickens, Manning. Has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reduced UK wage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2004, Vol. 167, 613-626.

# The analysis of the minimum wage effect on low income group for "increasing Income" and "maintaining basic living":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Jia Dong-lan<sup>1,2</sup>

(1. Chinese Academy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Beijing 100029, China;

2. Chinese Association of Labour Science,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As the only legal income standard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the wag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minimum wag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especially low-income workers, to obtain labor remuneration,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to "raise the low" in the reform policy of the national "raise the low, expand the middle and control the high"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low-income macro data and micro floating population data of Guangzhou Cit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adjustment on the "income increase" and "basic protection" of workers, and aims to analyze whether the minimum wage adjustment meets the most basic living needs of worker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come increase effect on low-income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can basically guarantee the basic life of the lowest income families, and the minimum wag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ages of low-income groups, and the income effect is of greater significance for the men under 30 years old, and the income groups near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Meanwhile, there is a spillover effect on income.

**Key words:** minimum wage; income effect; maintaining basic living; floating population

---

( 上接第46页 )

## Literature review on think tank journals of China

Wang Meng, Ren Fu-jun, Zheng Li, Li Qi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CAST,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nk tank journals, as a platform for think tanks to publish research results to the society public, is figuring out how to seize this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 journals, and improve think tank support services which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By searching the articles related to think tank journals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since 2000,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nk tank journal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nk tank journal conceptual connotation, research status,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o as to reflect the latest progres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 journals.

**Key words:** think tank journals; statistical analysis; existing problems; development suggestions